

经典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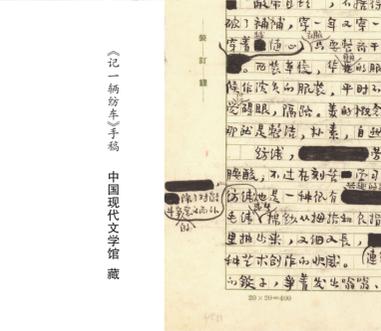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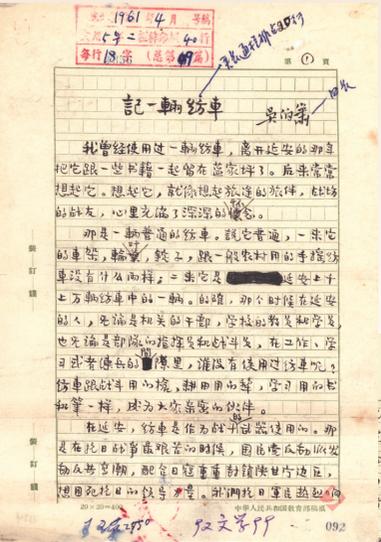
纪念



吴伯箫(1906—1982),山东莱芜人,散文家。他的散文创作始于就读大学期间,《火红的羊》《花的歌咏》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20世纪30年代,吴伯箫创作了《山屋》《马》等多篇回忆童年乡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散文,收录于散文集《羽书》。他的散文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充满对社会和人生的关切,向武力求传统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吴伯箫不断尝试散文文体的创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融合“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吴伯箫的创作走上新的道路,他的作品与人民群众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写下《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出发点》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在工作之余,仍不断坚持写作,创作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回忆延安生活的佳作,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

今年是吴伯箫诞辰120周年,本报特邀学者白桦、王兆胜撰文,评论吴伯箫卓越的文学成就,追忆其精彩的作品人生。

——编者



吴伯箫

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默默奉献的“无花果”

——吴伯箫和他的散文创作

□白桦

吴伯箫的文学生涯,跨越现代和当代;吴伯箫的文学实绩,涉及文学教育和散文创作。自1925年在大学求学期间“开始用白话写作”以来,他一生都在散文的艺术领域里默默耕耘,不懈劳作,不同时期都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成为半个多世纪里始终保持孜孜不倦的探求姿态的散文大家。

吴伯箫谈到自己的散文时,曾说道:“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这一自谦式喻比,却也道出了吴伯箫散文的艺术真谛:无花果,不务虚,只求实;不见花,只结果。吴伯箫的散文确有如此相似的品格。它素朴自然,没有构思上的矫揉造作;它蕴藉深沉,没有内蕴上的显露浅薄。它总是以丰富深厚的内涵发人深思,又总是以隽永深远的情思引人遐思。它像无花果一样,没有争奇斗艳之意,只有默默奉献果实之心。

教育事业中坚持文学写作

吴伯箫晚年回忆自己的散文写作时曾说到,自己早期的一些作品,“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的同志说是‘不务正业’”。这种自谦式的夫子自道,其实也是一种真情陈述。吴伯箫早年“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他自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始终聆听于组织的分配,坚决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行政工作,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履历和主要旋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吴伯箫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就回到山东原籍,先后在济南乡村师范任教,在莱阳乡村师范任校长。自1938年4月,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之后,从事文化教育战线组织领导工作,这成为他此后所从事的主要职业。

延安时期,吴伯箫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他以业余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随后到张家口,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系副主任;之后又调东北,任东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副院长。1949年7月,他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就任东北教育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前身)副院长。1954年调至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副总编辑,兼任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研究所)所长。1969年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整风运动中被错误处理。“文革”之后的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81年当选中国文联理事。1982年因病逝世。

由以上的经历可以看出,吴伯箫从西北到华北,从东北到北京,辗转过不少地区,调换过许多单位,堪称“革命事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光辉典范。这些职位与经历还告诉人们,吴伯箫的主要工作,一直都是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散文写作于他,确属正业之外的“副业”。而他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都一直坚持散文写作,并在不同时期都作为佳作构而思,实际上也与他始终不脱离工作,不脱离生活密切相关。工作与生活,给他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与无尽的动能。

很有幸,我与吴伯箫先生打过一些交道,并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伯箫先生恢复工作后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我当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文学研究所同在建国门外的日坛路六号的一个院子里办公。那个时候,我读了吴伯箫先生的一些散文,对他很是敬佩和仰慕。偶尔看到他那边沉重的步子走过院子的伟岸身影,很有一种寻机拜访他的冲动。一次我大着胆子去找他,提出了一些文学写作问题向他求教。吴伯箫先生放下别的事务,以和蔼可亲的态度热情接待,耐着性子作答。有时看他太忙,我就提一些简单问题写纸条留给他,他先后都给我认真回复了。如此的信件往来,大概有三四次之多。后来才知道,他那时除去文学所的各种事务,还兼任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担子很重,事务繁多。我的不期而至的造访与求教,其时都算是打扰。由此,吴伯箫先生就更令我敬重不已,至为感念。

散文创作领域的无尽探索

吴伯箫在散文写作方面,是有自己的想法与追求的。他谈到早年的创作意向时说道:“曾尝试创作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情感,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山水、原野以及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他朝着这样的总体方向,一方面坚持孜孜不倦的艺术探求,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地自我调整,至20世纪30年代,已在散文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40年代,走向散文写作的相对自由的境界,成为现代时期散文领域风格独具的重要一家。

吴伯箫自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就开始了散文写作,并在京津报纸副刊上连续发表作品。经过这段时间的写作历练,到30年代初期,回到山东在济南乡村师范等地任职时,创作了以儿时乡村记忆为题材的作品,借以寄寓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祈念,宣道对于黑暗现实的愤懑与不满。《羽书》收入的《马》《海》《荠菜花》《岛上的季节》(我还没见过长城(生活沙飞之二))》等篇什,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马》由马串联起乡村生活的热闹景象,表达自己的乡土情愫;《海》描写作者所喜欢的海滩、海潮、海风、海雾,写得气象万千,令人神往;《我还没见过长城(借沙飞之二)》由北京的名胜古迹说到万里长城,尽情抒发作者对于长城的崇敬、向往和思念,通篇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战斗激情。这一时期的作品,逐渐显露出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个性追求,那就是在追求内容的诚挚与真切的同时,尝试和运用适于内容表达的艺术形式,逐步形成一种以小见大、由朴见真的艺术风格。

1938年4月,吴伯箫过多地辗转终于到达延安,投身于革命的熔炉,深入到抗战的前线。环境的转化与情感的强烈变化,促使吴伯箫的散文写作随之发生之变化。他在戎马倥偬的间歇写就的作品,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新的样貌。写作于这一时期的《记乱离》《夜发灵宝塔》《神头岭》等作品,均为抗战生活的内容,并带有纪实叙事的特点。如《神头岭》由渡河听戏,月夜行军生活,老妇人的叙述,描述了八路军129师386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的战斗情形,歌颂了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具有“大我”的意味与时代的气息。

1942年5月,吴伯箫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聆听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场座谈会和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对于作者的思想世界的改造与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吴伯箫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子,使他的散文写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表现出新的进取与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南泥湾》《火红山》《上种树》《黑红点》《出发点》等系列散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着力于延安和边区的新人、新事、新风的描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领导的敬仰和延安军民的崇敬敬意和深厚情意,以及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自豪感。如《出发点》着意描述从延安出发的意义所在:“从此出发,中国有了广大的解放区。”从解放区出发,我们看到得到全国,“广阔的胸怀,坚定的自信,磅礴于言表。而艺术表现方面,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在以往以小见大的艺术程式之上,又呈现出争取生活高瞻远瞩,提炼题材大处着眼的崭新高度与新趋向。

以优秀篇章助力语文教学

吴伯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由东北调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

副社长、副总编辑并主持语文教材的编写和从事文学教育工作。这一时期,他的本职岗位任务繁重,工作繁忙。他既要与叶圣陶部长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还要“审稿子,改稿子”,“全力投入,一丝不苟”。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学习》编委等职务。但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个时期,吴伯箫在散文创作上连续推出新作,广泛获得好评,又登上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蓬勃勃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激发了作者极大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则是长期的生活积淀与情感沉淀,让作者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上,都有了更多的写作资源与很大的艺术自由。吴伯箫谈到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时,曾写道:“回到延安写实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高尔基写《我的童年》不是在他过流浪生活的时候,而是在他童声世界文坛之后。现实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则不行。住往要后天写前天,二十年后再写二十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想写又不轻易去写,直到酝酿成熟才去动笔,完成之后再等待时机发表,如此长久的生活积攒、持久的情感沉淀,不断的艺术打磨,使得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都是厚积薄发、博观约取的成果,因而读来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咀嚼。

吴伯箫这一时期以延安生活为内容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延安的歌》《窑洞风景》等接踵而来,形成了佳作联袂的蔚人景象。《记一辆纺车》写他对留在延安的“一辆纺车”的回忆与怀念。作者记叙了作者从学习驾驭纺车,到掌握纺线技术的经历。纺车伴随着作者,成为作者“劳动后收获的愉快”,作者与纺车产生了“骑士对战斗马的依恋”。作者讲述了自己从不会到学会的过程,从“恨”到“爱”的转变,还讲到纺车在“自力”方面的好处,在“丰衣”方面的贡献,以及纺线竞赛的热闹场景和集体劳动的精神风貌。在这样细致的描写中,“一辆纺车”活了起来,成为劳动的象征、精神的符号。《菜园小记》记述了作者在延安时与两位战友一起经营一块菜园的趣事。在这块只有二分三分的菜园里,他们松土、下种、施肥、浇水,学会了种菜,享受了乐趣,更收获了韭菜、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多种蔬菜。作者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这块菜园承载的希望与生机,带来的收获与乐趣,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大生产时期的历史场景。《延安的歌》则记述了从大生产到报告会、延安所盛行的“唱歌风气”,“歌声从心里流出来”,“又唱到人们的心里”,简直成了“歌的河流,歌的海洋”,“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延安》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讲述了作者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家”的学习与工作,生活与劳动的感受,以及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历练与成长。作者的亲身经历,加上“三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的谚语,使得“延安是革命的熔炉”的结论不证自明,令人格外信服。

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相得益彰,《记一辆纺车》等作品在文坛内外引起高度好评和广泛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起,《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作品就被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入,成为助力青少年学生语文学习和健康成长经典的篇目,在语文教学与育人成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素雅含韵的艺术启迪

吴伯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散文写作中,既保持着积极有力的进取姿态,又保持了持久不衰的创作活力,为读者奉献了常常读常新的精品力作,为现代当代的散文写作谱写了精彩的艺术华章。他的独特而出色的创作实践,也为散文写作乃至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成为散文写作的艺术特点及其主要成因与基本经验,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观察。在我看来,尤以三个方面的成因与经验最为凸显也更为重要。

第一,与生活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吴伯箫从早年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到后来供职于文化教育行政部门,始终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教育行政工作本身就是生活之一种,而吴伯箫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都高度重视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了解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并在接近与观察中,体察人民生活的内在韵味,把握时代生活的内在脉动。他早年记述儿时乡村记忆的作品,无论写马、写鸡,还是写山、写水,因为都有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独到把握,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后来撰写抗战生活和延安往事,都是从小人物、小物件、小景观写起,由小见大,以微见著,由一个感人的小细节与微事件,来表现劳动的乐趣,揭示人生的哲理。可以说,他对对于现实的深入了解,对于生活的深沉观察,使他的作品有了坚实的內容基础和深厚的情感支撑。丰富而厚实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吴伯箫散文作品的內容鲜活与韵味隽永,使人读来亲切生动,读后回味无穷。

第二,写作的要点在于“回味”的过程。吴伯箫的散文,不同时期都有颇具影响的力作,但评价普遍较高、影响也较为深远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作的反映延安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的问题时,他所写的“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一席话,既是解释自己“二十年后再写二十年前”的原因,也是在阐明创作者需要对所占有的生活进行一番“回味的”升华的过程。吴伯箫的“回味的过程”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厌,历久弥新,就在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思想的浸润、艺术的蒸馏,写作水到渠成,作品瓜熟蒂落,而且题材更典型,内容更深厚,意境更丰沛,语言更凝练,作品所蕴含和所呈现的,都是岁月的精华与历史的经验。这样写作了较长时间“回味”过程的作品,一出手就如同开启了封存20年的陈酿老酒,醇香浓郁,回味无穷,沁人心脾,醉人醉心。

第三,朴中见色的文风。吴伯箫特别重视文风的问题。他在《文风不是私事》一文中,讲到“好的文风”的三个要点:一是表达必须正确,二是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之后,他还有一个总体性要求:“做到深入浅出,令人百读不厌。”如许的文风论述,其实都是经验之谈。吴伯箫早期的散文,侧重于借物说事,以事抒情;后期的散文,侧重于以事述史,以史说理。但就其艺术风格来看,是在不断地走向朴实与素雅,具有平中有奇,淡中有浓、轻中有重、朴中见色的鲜明特点,可以说是摒弃浮华,返璞归真,洗净铅华,含英咀华。显而易见,这种素雅含韵的艺术境界,一般作者很难达到,因而弥足珍贵。

回望吴伯箫的创作生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不同时期的呕心沥血之作,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社会从现代到当代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变迁的许多重要画面,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个追求革命和执着艺术的知识分子,以自己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默默奉献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成为人们所喜爱的杰出散文家的奋斗历程。这一切,都是吴伯箫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文学遗产,也是激励和助力我们努力攀登新时代文学高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也同这些文学遗产、精神财富一起,活在我们的理念里,活在人们的阅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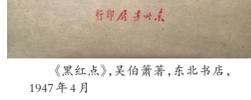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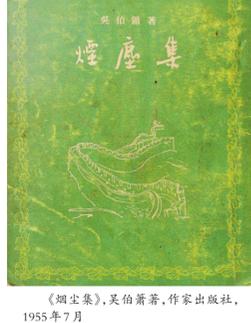
《羽书》,吴伯箫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



《黑红点》,吴伯箫著,东北书店,1947年4月



《烟尘集》,吴伯箫著,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



《北颗星》,吴伯箫著,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



《忘年》,吴伯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吴伯箫散文长期入选中学课本,且篇目多、影响大,用常青树和不败之花形容亦不为过。那么,吴伯箫散文的魅力何在,怎样理解其价值意义,它对当下有何启示,这些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博大的爱与仁慈

□王兆胜

散文讲究“真情实感”,也是一门“交心”的艺术,还是散文家自我形象的塑造。因此,散文的好坏直接取决于作家有怎样的一颗心,如何对待人、事、物,“博爱”的境界,力量在于能超越“小我”“小情”“小爱”,进入“博爱”的境界。

吴伯箫散文也写亲情,如慈祥的祖母,但主要歌颂人与人之间的非“常情”,即那些没血缘关系的人的友爱。《点心的馈赠(鹑中杂记之六)》赞美大家庭里用的老妈妈子,有陈妈、程妈、高妈、刘妈,她们都是那样美好,尤其是瑛的嬷嬷——李妈。李妈与瑛建立了超越亲情的依恋与眷爱,一旦瑛生病,别人“无论怎样劝,都是劝不好的。只有李妈,她有那样强大的魔力,她一走到,或听到了她的足音,瑛的气便缓了一半”。《小伙计》写“我”与家人小佣工的爱情厚道,让人想到童年的鲁迅与闰土。《痴恋》写碧琴和星华两位十二三岁的小女生,她们有同性之爱;然而,作者一反世俗之见,认为这是两小无猜的友情,写道:“啊!神圣的爱罢!天真的爱罢!雪绒冰洁的爱呀!”显然,吴伯箫散文的“爱”超越了狭隘的亲情的,是纯洁、高贵、真诚的个性表达,所以才能更加感人。

对作家而言,“爱”人“易”,爱“物”难,吴伯箫散文擅长写“物”,并充满一腔挚爱。《火红的羊》写少女不顾父亲与家人反对,守护那只火红的羊——被别人视为“不祥”之兆,为此,她被赶出家门,也绝不屈服。这是作家对“一个人类中最柔弱的少女和一个动物最怯懦的绵羊”的深情与大爱。《花的歌咏》既歌颂花儿,更歌颂太阳,作家称“草”为“花”之“弟”,认为“太阳”是“俊俏而伟大的”,太阳对这个世界有多么亲切的爱情”与“多么热烈的爱”。这是吴伯箫用“爱”编织的天地自然,具有“爱的哲学”的意蕴与感染力。

“博爱”之“物”容易理解,但对人们反感甚至厌恶之“物”也付出爱,这在吴伯箫身上尤为可贵。别人喜欢白天,不爱黑夜,吴伯箫《街头夜》却说,“我爱白天,也爱夜晚。”“我爱夜,真的,我爱深夜。”“严酷的冬季,夜就更妙了。”在《伴中》,吴伯箫不赞同“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偏见,而写“我”甘愿与黄蜂、蜗牛、老鼠同室而居和相互为伴。作者说老鼠:“我觉得这样一条生命,确是令人爱怜的了。”“它好比我的一个远路的知友。”还有苍蝇、飞蛾、蛛网,在吴伯箫看来“处处都有生气,无一而非可爱”。这是兼爱与大爱的闪光。

当吴伯箫超越一己之爱,甚至超出亲情,心中有“大爱”与“悲悯”,他笔下的人物、事就有了高度和境界,也容易感人,散文也能写得真实、柔软、灵动起来,这与“零度”写作,有分别心的认知、狭隘的爱是大为不同的。

小叙事与大情怀

散文最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小情小调的自我玩味与梦语,二是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这是长期为文诤病的。吴伯箫散文以“小叙事”写“大情怀”,这离不开他扎实的生活基础、独特的审美情调、强烈的时代感、宏大的政治意识。

以熟知的日常生活小事为切入点,有助于让散文变得真实可感,形象生动并产生共鸣。文学创作一直强调要有生活,深入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感受、发现,否则就会陷入空泛甚至虚无。吴伯箫散文的人物、事都很“小”,有的甚至显得微细,像《马》《灯笼》《荠菜花》《痘》《黑红点》《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都是如此。不过,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能观察得细,发现得真,体味得深,表达得实,给人身临其境、如在眼前、活灵活现的艺术感受,如作者写种菜发芽生长的场景:“你留心那平整葱绿的菜畦吧,那里从那里会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那些新芽,条条的排列着,无数的矮小的嫩苗,密密的、绿油油的,不带着什么气味,充满了无限生机,一棵棵新芽简直是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如“无生活经验、细致的观察与独到的发现,不可能分辨出条播、撒播、点播之细微差别,更难用形象的语言来新生芽写得如此形象生动、摇曳生姿。

最重要的是,吴伯箫散文没停留在细小微末的人物、事描写上,而是以“大情怀”为旨归。通俗点讲,这是“以小见大”;从专业角度讲,这是境界与品质的体现。因为平凡中出奇,旧日出新,常而不腻,是最见作家深厚功力与创造力的。如《菜园小记》一面是写种菜这件小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写延安农民在特殊环境下的伟大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勤劳拼搏、敢于创造美好的新生活,因为珍珠般的菜的新芽与红军从小到大的,由弱变强具有同构性。“且”通过鲁迅小时候在书桌上刻的一个“且”字,思考人生意义并进行哲理思考,于是,吴伯箫概括说:“黎明即起,孜孜为善”,的确要早。要热爱时间的清晨,要热爱生命的春天,要学梅花,作“风雨后一枝”。《送寒衣》写中国抗日军民,特别是普通人——妇女、儿童全力参加抗战的感人故事。作品写道:“送寒衣,动动就是八千双鞋,七千套棉裤背心,白里黑里的鞋,这给的是前方将士的战士,天冷了,可并不等战士们开口,也不等这十月里的十月一日,工厂的哭声也变成了闭紧了嘴唇的微笑。”基于此,作者说:“喜讯还是落在后边,白昼如梦变成了现实,怀着坚强的胜利的信心,腰挺直了,我忽然睁了眼泪汪汪歌唱!中国是有光明的前途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你们发抖吧!”“自小气的‘寒衣’,到被污辱惨害的人民觉醒,以及整个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种‘大情怀’是响彻云霄和撼天动地的。”

吴伯箫是革命作家,他一直葆有一颗爱国的初心,强调本色的美,这是其散文更内在的底色。他曾在《说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写到:“我们像太阳洗脸洗得像晴朗的天空,一个意蕴,如一颗金项链在光,一脉思想,如一只白鹭在飞翔,总是清晰、爽朗,一尘不染;对事,我们像白桦一样分明分出是非,对人,会像太阳和风马一样会披黑黑,黑黑”不过,这离不开“日常生活”,因“奇迹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文风不是私事》有一段话:“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语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篇幅不要太大,删节任何多余的话。”这是人为为文的核心与本色,也是有爱心、敬畏心、初心、素心、诗心的显著特征与标记。

总之,吴伯箫散文有时代感、有高尚性、政治信仰,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高尚的人民本位、朴素思想、审美趣味,还有一颗善心、爱心、初心,这是它影响力长久不衰的可信保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南昌大学特聘教授)

长久的盛开

□王兆胜

20世纪30年代中,吴伯箫散文在乐观主义情绪中透出一种对社会的不满,特别是对底层普通生人的关爱与眷念。《舅母家去》《病》《夜(残篇)之七》《难担与叫卖》等都是如此。《清晨——夜歌》发表于1926年4月14日,是为三一八惨案写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不到一个月,可见吴伯箫对时代的敏感与反应速度。文中说:“自从上月18日惨案以后,每因白天枪杀了一个人,到夜里便恐怕有谁来暗杀;没有人的地方也不敢单独人独自的站立,这就是众人谈笑风生的散文。《静议》写一个叫杨懒的穷汉,他总是骂骂咧咧,对什么都不满,特别是醉酒后从村口穿过全村到村东,回到自己的破屋里,一路的骂声将世道人心映照出来。对富而不仁的百姓的诘问,杨懒用‘你配吗!哼,哼,……是人么?不是东西!’回敬。当伍子拦住他并质问为何骂人时,杨懒骂得更凶,‘你才知道我骂人?早就骂得那些破仗王八蛋!’结果被‘不好’的伍子打了一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吴伯箫散文是社会、时代、政治的回音壁。

进入20世纪三三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烽火点燃了吴伯箫的激情,这使其散文有了血与火的光影,作为时代文学,反映抗日的散文很多,吴伯箫散文为其一,他的散文通过凡小事写作者的残酷与人民的无私和智慧,以其自身特点感人至深。《黑红点》用“黑点”与“红点”给汉奸、伤军、帮敌人做坏事当狗腿的家伙记录善举,以此作为抗战的一种特殊方式。(一坛血)写用坛子将被敌人杀害的军民的“血”装起,成为抗日杀敌的血祭,散文书写撼人心魄。《马》心底思想写日本马伏田野野郎助一只只鹦鹉的故事,吴伯箫从鹦鹉的日本马伏田野野郎助,这是个仄庆和多言之人,因日记写“战争不但使人类痛苦,并且使你也为人类之痛苦而痛苦”,“以后我不说话了,病从口中,病从口出,以后我只写下来”。这反映了吴伯箫散文的特色与深度。

全国解放后,吴伯箫写过大量歌颂延安与抗战军民的散文,这一方面是回忆,一面是纪实,《歌声》《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延安》等成为代表作。与以往相比,吴伯箫此时期散文的时代感与经典性更强,艺术更加成熟。如《歌声》写“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不仅如此,开会、休息大家也唱歌。而且,延安有各式各样的唱歌,合唱、独唱、舞唱、接唱、联唱、轮唱,这是生机勃勃的延安才有的歌声。

当一个作家与时代、社会、政治碰撞,再艺术化的表达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吴伯箫散文是时代、社会、艺术、人民写作,用普通人最熟悉的题材、调子、风格进行表达,这是其具有长久生命力和深入人心的法宝。

素朴的诗心

吴伯箫散文有诗心,这是一颗素朴的诗心。它没有夸张、抒情、高昂,而呈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这更增加了其独特性在于内在美。

吴伯箫最擅长用白描手法,也喜爱细节刻画,还讲究文字的深入浅出,重视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是其散文文字、耐读、长久、有味儿的秘诀。以《记一辆纺车》为例,写纺线的几种姿势,特别是站着纺线,极具观赏价值,还有纺线的情态,被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让人想到孙犁笔下的《织布记》,是那样的平白、自然、优雅、又力透纸背,有着令人折服的非线性哲学,作品这样写:“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粗细如拇指和食指中间的那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嗒嗒的声音,像演奏乐声,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蔼的、优美的。”这是诗,但不夸大,也无炫章,而是素朴、清亮、自然、自由、欢快、优雅,给人难以描绘的舒畅之美,它像潺潺流水般洗涤着世道人心,画面难忘。

吴伯箫是革命作家,他一直葆有一颗爱国的初心,强调本色的美,这是其散文更内在的底色。他曾在《说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写到:“我们像太阳洗脸洗得像晴朗的天空,一个意蕴,如一颗金项链在光,一脉思想,如一只白鹭在飞翔,总是清晰、爽朗,一尘不染;对事,我们像白桦一样分明分出是非,对人,会像太阳和风马一样会披黑黑,黑黑”不过,这离不开“日常生活”,因“奇迹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文风不是私事》有一段话:“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语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篇幅不要太大,删节任何多余的话。”这是人为为文的核心与本色,也是有爱心、敬畏心、初心、素心、诗心的显著特征与标记。

总之,吴伯箫散文有时代感、有高尚性、政治信仰,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高尚的人民本位、朴素思想、审美趣味,还有一颗善心、爱心、初心,这是它影响力长久不衰的可信保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南昌大学特聘教授)